

10
江蘇文史資料選輯

第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江苏文史资料选辑

第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402/09

江苏人民出版社

封面题字 萧 娜

江苏文史资料选辑

第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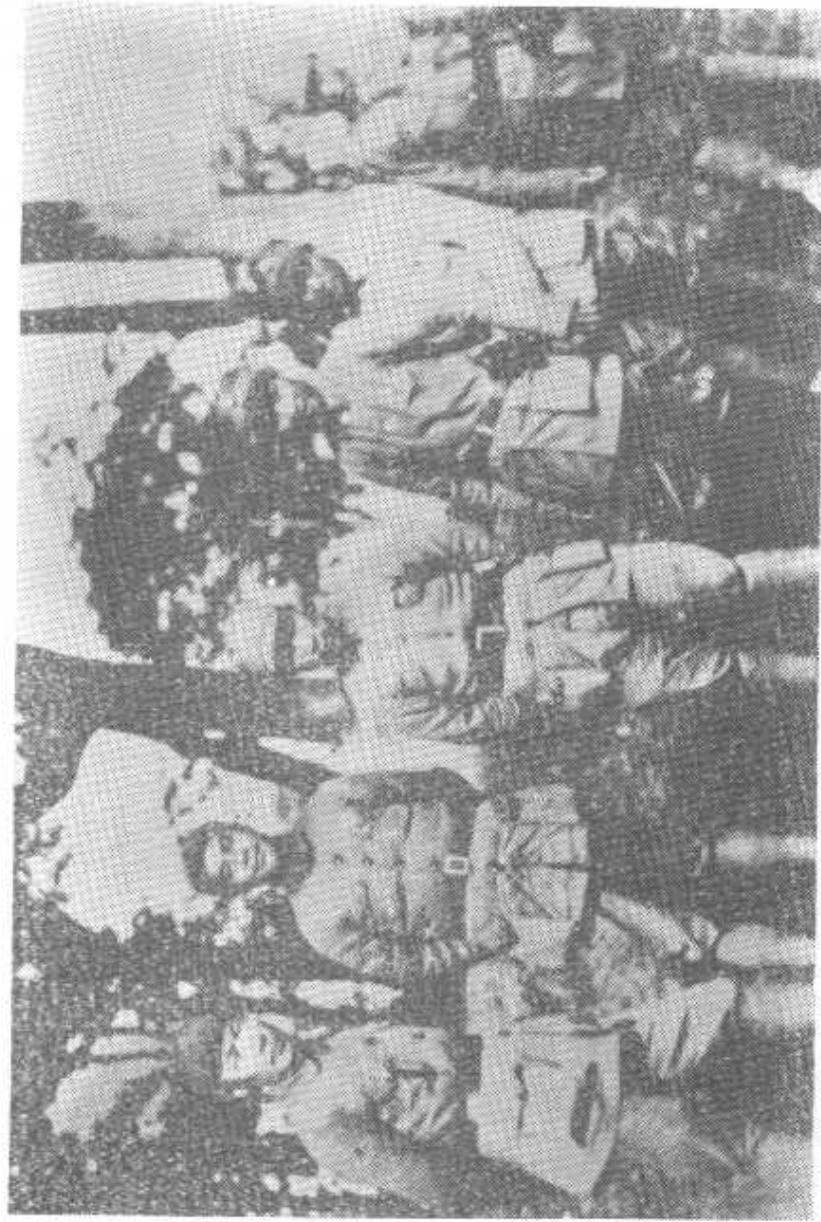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375 字数 167,000
1982年1月第1版 198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书号：11100·065 定价：0.78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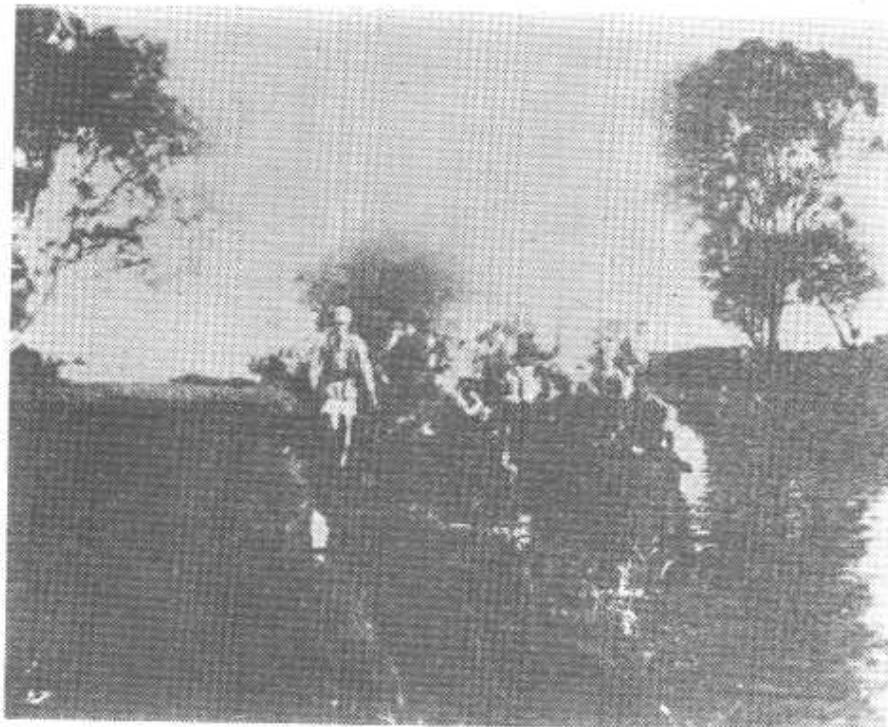
(内部发行)



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部分同志在溧阳水西村。左起：陈毅、
刘炎、划飞、叶飞、吴混、齐信民。



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广大地区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图是新四军向华东敌后挺进，开辟根据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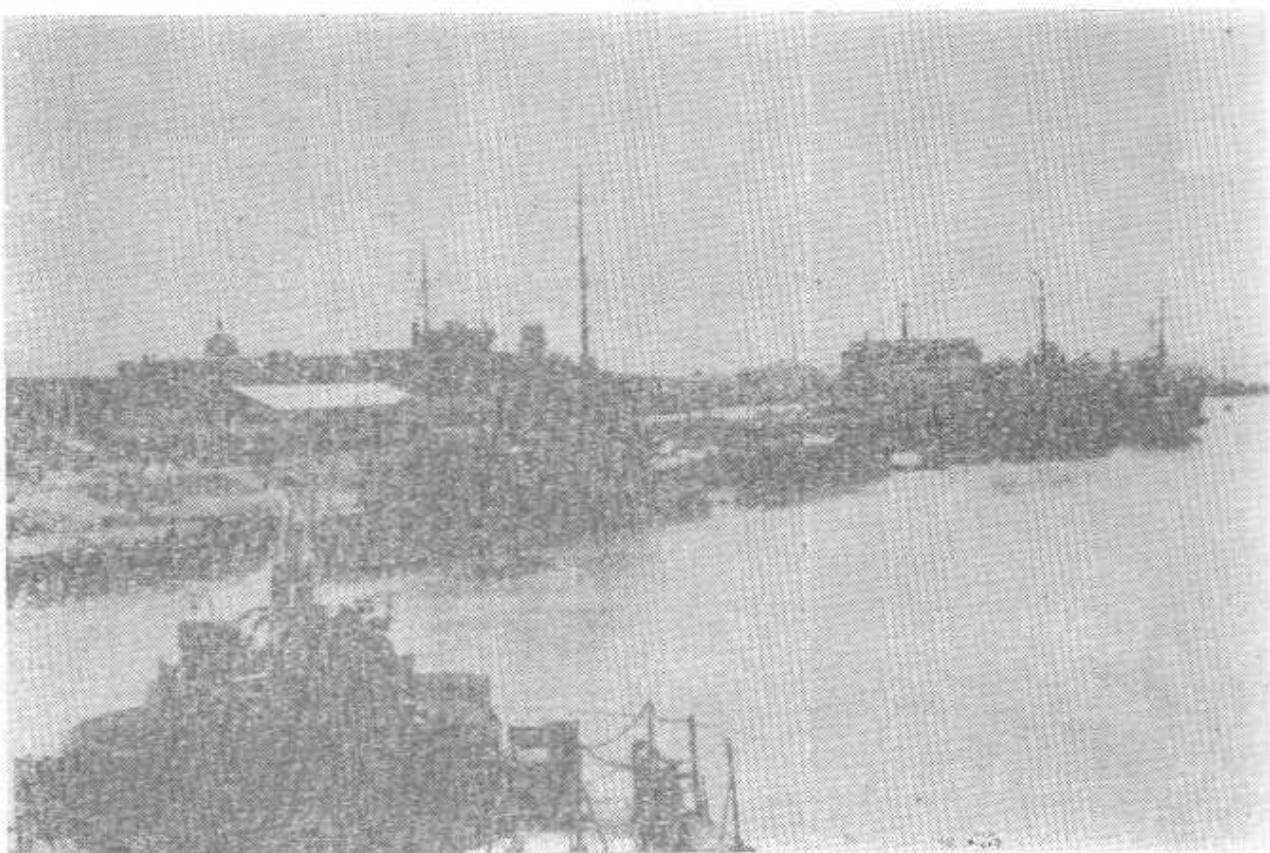
东进纵队挺进苏州、常熟和上海近郊，建立苏常太解放区。这是在无锡地区的江抗游击队。

蘇軍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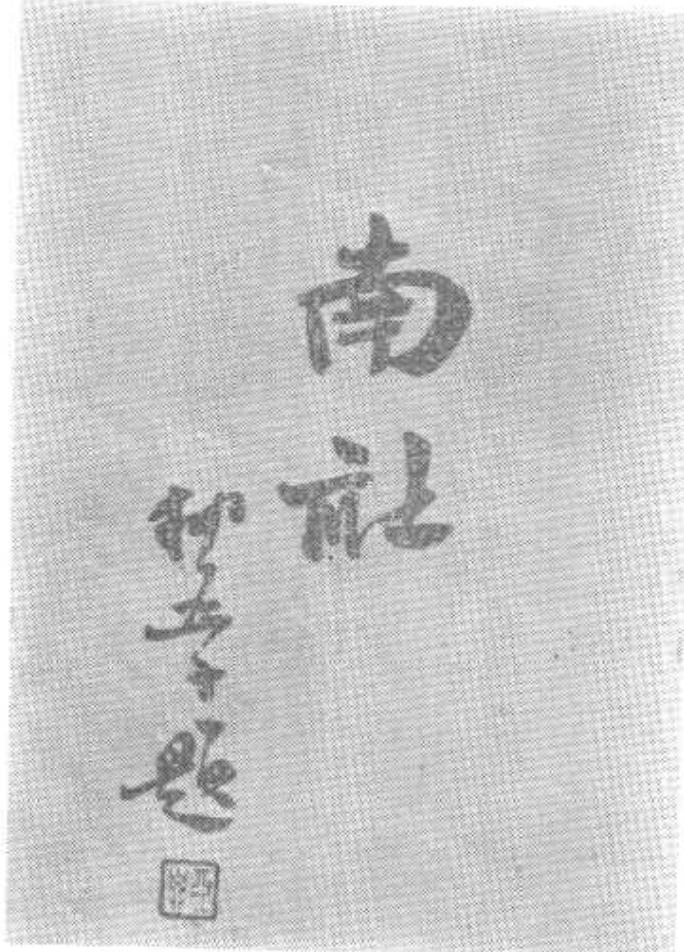
東山政委、參議委員、書記員、參謀、司務長
答應盡職的你這次不能過。貴艦隊
所立的這些決定完全正確，必須為
建設人民的新海軍而努力前進。
為圓滿解決上述問題，請你今夜
至晉江兩京石廟底紅旗找我們，一切商
量面商解決。

軍委會主
委員何先有
總指揮朱德
總參謀長林遵
軍委會主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司令部给原国民党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的一封信（本件为郭秉衡同志提供。郭秉衡同志原为国民党第二舰队“联光”舰舰长，为当时参加第二舰队起义领导者之一）。



原国民党第二舰队在南京笆斗山江面举行起义后，起义舰只停泊在下关的情景。



柳亚子为南社题字。



南社第一次雅集，柳亚子与梅兰芳、黄炎培、胡庆树等合影

(1909年春在苏州张东阳祠，前坐左起第三人为柳亚子)

南社第一次雅集(1909年)

南社第一次雅集。

(1909年在苏州虎丘张东阳祠，前坐左起第三人为柳亚子)。

目 录

新四军领导苏常太地区人民抗日斗争纪要

- 杨浩庐 (1)
苏南地区抗日武装斗争纪要 夏光 (43)

新四军东进前后南通地区的革命斗争

- [赵毓华] (73)

回忆我党领导的澄、武、锡地区的革命活动

- 张志强 (123)

回顾日寇的经济封锁和我们的反封锁斗争

- 顾复生 (143)

南京江面上的壮举 陈务笃 (152)

——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起义前后

- 附录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司令部给原国民
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的一封信 (190)

- 附录二：参加起义辩论会的人员名单表 (191)

- 附录三：笆斗山江面各舰艇停泊示意图

南社的人鬼殊途 陆丹林 (194)

我所知道的南社 谈月色 (201)

瞻园沧桑 韩品峰 (209)

《江苏文史资料选辑》勘误表 (230)

新四军领导苏常太地区人民 抗日斗争纪要

杨 浩 庐

从1938年2月至1941年7月日寇“清乡”、最后突围转移，这一段时间，我一直在苏常太地区工作。苏常太地区人民，在共产党、新四军领导下，对日寇、伪军和反共顽固派进行英勇斗争的历史，大多是我亲身经历的，一部分是我同有关同志共同回忆、交谈了解核实的。但因时间既久，而我又未曾自始至终地参加该地区全面领导工作，因而所纪史实，必有失实和错误之处，请了解事实真象的有关同志阅后指正。

(一)建立武装，开辟抗日游击区

我原来在上海地下党工作。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日战争爆发、苏南地区相继沦陷后，上海党(江苏省委)为了开展苏南敌后抗日武装斗争，1938年2月初，党组织决定我到常熟工作。并介绍我同李建模同志认识，决定我同他一起去常熟，一切由建模同志负责安排。几日后，我们两人从上海乘轮船到浒浦上岸，经文村到梅李镇，我被安排在镇上李建模同志家里住下。

党派我下来的任务是：了解敌后情况，准备搞武装斗争。当时，李建模同志已购买和收藏了些枪枝弹药，准备组织抗日武装，这是国民党军队被日寇击溃逃跑时丢下的武器，被老百姓从河里

捞出来出卖的，一枝步枪一两块钱，一枝轻机枪十多块钱就可买到。我到梅李后，建模即介绍几个同志同我认识：陈振华（即陈刚，家住梅李镇，在自家布店当店员），薛惠民（家住梅李附近薛家宅基，当过店员），顾鉴修（在浒浦当店员，家住白宕桥），还有小市的王志平（当过小学教员）。同我经常联系了解和研究当地情况的是陈振华、薛惠民、顾鉴修三人，此外，还有当时住在常熟城里的华玉鼎（他们几个人抗战前都有过党的关系）。通过陈、薛、顾等同志，逐步了解常熟东乡敌伪力量及许多地方游杂部队的情况和群众的生活情况，逐步了解敌后占领区的面貌。

常熟东乡，是指从西面的福山到常熟县城，南面到阳澄湖以北，东面到太仓县界的地区。当时各地有各色各样的“游击队”。在徐市一带，有陈震寰部队。陈不久接受了国民党特务熊剑东的委任，部队番号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淞沪特遣支队琴嘉太昆青松游击司令部”所属“第六梯团”（简称六梯团），任命陈震寰为梯团长。熊剑东还以司令的名义到处加委，收编杂色部队，扩大实力。在常熟东乡除陈震寰的六梯团外，还委任了东塘市的曹昌金部为第十二梯团。当时，陈震寰、曹昌金两部，号称各有人枪七、八百，是常熟东乡两支最大的部队。

陈震寰是一个农村小知识分子，常熟人，大革命时参加过党，在北伐军十四军政治部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失去了党的关系，后来在生活上染上了抽大烟的恶习，在政治上还没有做过什么坏事。“八·一三”全面抗战爆发、11月份常熟沦陷后，大约在1938年初，陈震寰在家乡就开始以徐市为中心，在徐市、何家市、归家市、归庄、东张市、吴家市一带，组织抗日武装。但陈不能完全掌握这支部队，实际权力是掌握在周毓文和顾彦儒及归家市的地主、后来当六梯团副团长的吴善述等人手里（顾彦儒当时是沦陷后的

国民党常太专员，周毓文据说是国民党的常熟县长）。

据后来了解，陈震寰组织部队时，曾经写信给无锡梅村的陈枕白同志，找过党组织关系，陈枕白同志当时因为不清楚陈震寰的情况，不好明确回答，只简单的回复说，自己也在找党。说明陈震寰当时是想找党的关系的，但是没有找到。大约在1938年5、6月间，掌握该部实权的周毓文、顾彦儒同徐市的地主商人皇甫渡，互相勾结，从中牵线，接受了熊剑东的委任。不久，熊剑东亲自来六梯团，以陈震寰部队为基础，组织起他的司令部，陈震寰部队就这样逐渐被熊剑东控制掌握了。

周文在、王志平同志，当时都在陈震寰的部队里工作。王志平同志常来我处，会谈陈部的情况。当时我们正在组织“民抗”部队，无力顾及该部。文在同志在陈部工作了一段时间，见陈的部队乱七八糟，陈自己又不能掌握，他就离开部队，去上海找党。熊剑东掌握了六梯团，文在同志走后，王志平同志单枪匹马，就更难在该部开展工作了。

当时常熟东乡第二个较大的部队，是东塘市的曹昌金部队，曹昌金是苏北人，是个青红帮。他的部队实际比陈震寰部小一点，约有五、六百人，占据在以东塘市为中心的肖泾、陆巷、横泾、李市、任阳一带。这支部队，我们没有人在内工作，只是通过该地区同我们有联系的个别进步青年了解他们一些情况而已。该部名义上属熊剑东的十二梯团，但熊未能控制掌握，基本上是独立活动。

东乡第三个人数较多的部队，是以珍门庙为中心，在沈家市、董浜一带活动的吴文信部队，约计有二、三百人。吴文信也是青红帮，苏北私盐贩子。这支部队没有什么正式名义，吴文信自称大队长。大队副茆春华，是一个失去党的关系的同志，茆的弟弟

茆健群也在这个部队里当参谋。茆春华是知识分子，苏北人，李建模同志1935年曾发展他入党，后来李在上海被捕，他就失去了党的联系。由于浒浦一带苏北私盐贩子和青红帮多，茆同他们有苏北同乡关系，本人又是知识分子，会办事，原来同那些人就已熟悉，吴文信是大老粗，所以要茆当大队副。除了茆氏弟兄外，另有王志昌、王智敏（后来在江抗部队缴了吴部枪以后，他自动脱伍了），也在这个部队里工作，他们当时都没有党的关系。民抗部队成立后，除通过徐少川关系做吴文信的工作外，主要就是通过这几个同志来了解吴部情况并做吴文信的工作，来促进吴部同民抗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合作关系。

除此之外，在东乡边沿的羊尖、练塘、杨树园一带，有马乐鸣部，后来属国民党保安队，马任纵队司令。另有安蔚南，他是国民党常熟县流亡县长，同李建模同志认识。他的流亡政府当时没有什么实力。“民抗”部队成立后，他来搞过“统战”，我们没有理他，后来依靠驻在羊尖、练塘的马乐鸣部。

陆巷、肖泾以南的阳澄湖地区，是胡肇汉部队。胡是湖南人，当过国民党的下级军官。他的部队，大多数是收容国民党败退的散兵游勇组织起来的，也有少数当地人，约有两三百人，活动在阳澄湖的太平桥、渭泾塘、佃泾、湘城一带。翁迪民同志（化名宫岳）在该部工作，任政治部主任，是上海党通过关系秘密派去的。这个部队当时叫“苏北抗日游击队”（苏北，指苏州以北），胡自任总指挥，陆步青任副指挥（宫岳就是通过陆的关系去的）。这是当时除后来新六梯团外有我们党员在内工作的部队，该部当时也是独立活动的。

常熟东乡除了这几支人数较多的部队外，还有占据着一、二个小市镇或几个乡，有几十人枪，专行敲诈勒索、派捐派款的小

“游击队”。如在梅李北面的小陆星、王兴，各有三、四十人，都是青红帮，是徐少川的徒弟。先生桥则有赵培芝、王市有仲炳炎等。

在日伪军方面：除常熟县城外，锡沪公路上有古里、支塘两个日伪军据点；沿江港口的福山、浒浦、白茆口有日伪军据点。浒浦是苏北青红帮、“盐枭”集中的地方，又是常熟东乡货物运输集散的主要港口，在那里有苏北青红帮头头张慕芳、赵培芳、赵培德等，他们多少都有一些武装，与敌伪勾结，共同把持港口税收，按势力大小摊分税款。当时日伪势力，只是集中在上述少数沿江、沿公路的市镇据点范围，广大农村市镇都由各个“游击队”分据占有。他们大都各自在占领区内，向人民派款收捐，花天酒地，不时互相火并，大吃小，争地盘，只扰民，不抗日。

当时受过我党直接影响，具有进步思想，在家乡有相当威信的青年医生任天石，在家乡塘桥，联合毛鹏华、艾祖伟等也组织了一支武装部队。毛鹏华也是个青红帮地痞，艾当过保长。任天石同志在塘桥周围群众中有威信，在这支部队中，他能影响和掌握的一部分人，成份较好，其他大都是毛鹏华、艾祖伟的徒子徒孙。这支部队当时共有八、九十人枪，基本上是本地人，其中受毛鹏华影响的人比受任天石影响的人要多。在毛鹏华、艾祖伟影响下，多数人只是赌钱吃喝，没有什么抗日意志。

当时常熟东乡，只有梅李镇及其附近农村，基本上还是个空白点。虽有伪组织牌子，但实际不起作用；也不属哪一支“游击队”的“领地”。

以上就是我到梅李后，通过陈振华、薛惠民、顾鉴修、王志平等同志和我本人亲自所了解到的一些情况。

在1938年4、5月里，发生了梅李镇附近农民打“租栈”（由

伪组织出面组织的代城里地主收地租的机构)的事件。打租栈基本上是群众自发的，但参加的群众主要是薛惠民同志住家薛家宅基周围的农民，是受过党宣传影响的群众。好几百人，一下子把设在梅李镇上的租栈打了。第二天，日寇伪军从城里下来，到乡下抓了一些人去，薛家宅基一个农民被杀害，其余出钱保释。我们在这次事件中，通过薛惠民同志做了宣传教育工作，激发了他们对敌伪的仇恨，也为随后动员当地农民参加民抗部队和组织自卫队，起了思想动员的作用。

任天石同志于抗日战争前，在李建模、陈振华同志等影响下，思想进步，倾向于党。全国抗战爆发、常熟沦陷后，他出于抗日救国的热情，拥护党的抗日主张，同毛鹏华等合作，在家乡组织了游击队。但他当时不懂得如何组织领导这支部队进行抗日斗争。当他见到这支部队纪律差，不时发生扰民害民事情，他就主动向陈振华、顾鉴修同志提出，要求党派人去领导这支部队。经过我同李建模(当时常熟东乡只有我们两人是党员)商量后，决定由陈振华同志安排任天石同我见面，公开商谈。大约在五月初，我同天石同志在梅李附近乡下见了面，他具体谈了这支部队的情况，说毛鹏华部下已发生了敲诈勒索、扰民害民的情况，要求赶快派干部去帮助训练部队和领导他们，否则这支部队要变质了。当时李建模同志以经商为掩护，经常往来于上海和梅李之间，一是向上海党汇报乡下情况，二是把党的指示带回来。他还在梅李开了一家南货店，借此掩护，并解决家庭生活和工作经费问题。我同任天石会谈后，同建模同志再次研究，根据当时形势，认为是我们党公开组织武装抗日的时候了，应以任天石的部队为基础，再动员一些我们影响下的农民、店员参加，彻底改造这一支部队，正式组织我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李建模同志便到上海去向党组织

汇报请示，并要求派军事干部下来。上海党组织完全同意我们的计划，随即派军事干部赵伯华同志于五月下旬来常熟，并决定由李建模、赵伯华和我三个人组成中共常熟县委，李建模任书记，我和赵伯华主要负责组织领导武装部队。接着我们找任天石、陈振华、薛惠民、顾鉴修、王志平（当时他们还未正式解决党组织关系），一起商议，决定把塘桥部队中思想、成份较好的人抽调出来，并通过薛惠民、陈振华、王志平，从梅李、小市、横泾等处，动员一些店员和农民，取出我们购藏的武器，在塘桥附近的杨西团、周家宅基组成有四十几人的教导队，成立训练班，从六月一日开始，正式进行军事政治训练。训练委员会由李建模、赵伯华、陈振华、任天石和我五人组成，主要由赵伯华同我负责。赵伯华负责军事训练，我负责政治训练，陈振华也担任一点政治课（李建模回来时也来讲点政治课），任天石负责行政经费事务。训练班办了一个月，于六月底结业。

训练班一结束，我们就以参加过训练的人员为基础，正式组编塘桥部队为“常熟县人民抗日自卫队第一大队”（简称“民抗”），于1938年7月1日在塘桥附近的周家宅基正式成立。我们研究确定，在名义上暂时由徐少川为大队长，以任天石、毛鹏华为大队副，赵伯华任参谋长，我任政治部主任。徐少川也是一个苏北青红帮小头目，我们暂时争取他的目的，一是因为当时周围都是苏北青红帮搞的“游击队”，如占据先生桥的赵培芝，珍门庙、董浜的吴文信，浒浦、文村的张慕芳、赵培芳、赵培德等。徐少川本人是浒浦赵培芳的徒弟，徐少川徒弟小陆星、王兴，在梅李附近，也各有三、四十人。我们部队刚成立，力量不大，让徐少川当名义上的大队长，可以利用徐暂时缓和同这些人的关系，便于我们生存发展。二是因为我们缺乏经费。部队刚刚成立，不好马上就向人民

征收捐税，而通过徐少川，可以争取分得浒浦口的税收。当时在浒浦口每月征收的货物税，数额不小，除该据点日伪掠夺去一部分外，其余都由赵培芝、赵培芳、张慕芳、赵培德等瓜分。谁力量大就多分，谁力量小就少分；徐少川也有一份，他名义上是民抗大队长，我们就可通过他多分一点税款暂时充作部队经费。徐少川本人多分多得，自然他也乐意。民抗部队完全由赵伯华和我两人率领，徐少川根本不来，由我负责同他联系、取款，对他适当作一些抗日爱国的教育。这样，尽量多争取他同我们合作的时间，这对我们部队的巩固发展是有利的。至于毛鹏华，民抗大队部成立后，他也不同我们一起活动，他以大队副的名义，单独掌握他自己的四、五十人枪，同艾祖伟沆瀣一气，照老样子行事。我们则通过任天石同志继续争取他，要他集中部队同大部队一起活动。

民抗组成后，部队很小，只有四、五十人，但成分好，思想觉悟也好，群众纪律好，受到人民拥护。部队每日进行军事训练和政治理学习，做群众工作，晚上行军移动，过着集体、紧张、有纪律的艰苦生活。指战员一律每人每日菜金一角五分钱，津贴费每月四元。但活动地区小，只有以梅李、塘桥为中心的八、九个“乡”的范围，部队不能迅速发展。动员当地农民脱产参军，当时也没有条件。因为辖区内人民对民抗部队纪律好，坚决抗日，保卫人民利益，是非常拥护、亲如家人的，但要他们入伍参军还有困难；至于在本村本乡搞自卫队，保卫家乡，他们倒愿意积极参加的。为了扩大部队，我们除积极宣传，个别动员当地农民参军外，还通过上海党组织，从上海动员失业、失学的工人、店员、学生来乡参加部队。另一方面，我们为了整顿内部纪律，积极争取、分化毛鹏华掌握的那部分队伍，最后，全部解除他的武装，人员经过甄别审查，一部分遣散，一部分吸收补充到民抗部队。后来根据群众的要求，处

决了艾祖伟，逮捕了毛鹏华(经过教育后释放)。对原塘桥部队，经过这样彻底的整顿改造，再加上上海下来的工人、店员和青年学生的充实，到1938年底、1939年初，民抗部队就发展到有三个分队(等于排)、一百余人的部队了。当时三个分队的干部是：一分队长赵云鹤，政指陈岳章；二分队长李文魁，政指焦明(即冯二郎)；三分队长潘发棠(？)，政指周嘉善。

民抗部队成立不久，1938年8、9月间，上海党组织又先后调了韩雨青、焦明、陈岳章三个党员干部来民抗工作。韩是上海纺织女工，来后分配做民抗大队部党支部工作，并负责管理部队经费。陈岳章同志是上海排字工人，有文化，是一个很好的同志；焦明同志是学生，文化人，他们分任民抗分队政训员(后改称指导员)，加强了部队的骨干力量。他们调来后，民抗部队连赵伯华和我一共有五个党员(李建模不算在内)，成立了民抗党支部，受县委领导，部队由我同赵伯华实际负责。李建模同志仍任县委书记，仍经常往来于梅李和上海间负责同上级党联系。该年冬，专门负责领导苏南东路工作的东路特委书记林枫同志前来常熟，住梅李附近乡下一个多月，就近领导我们工作。

在民抗部队建立和发展的这段时间，东乡其他部队发生了很大变化。陈震寰部队(即六梯团)在民抗成立不久后，就逐渐被熊剑东掌握控制。在该部工作的周文在同志，当时尚未同我们直接联系见面，我们是经过王志平同周文在间接联系的。我们知道文在同志在六梯团负责政治工作，王志平也挂名在该部工作。王志平同志当时不是党员，当他告知我们文在同志要离六梯团去上海找党时，我们不便对他说常熟有党的组织，只请他转告周文在同志不要走，并约文在同志面谈，因为当时党没有公开，不经过上级党，我们不能向他们公开党的关系。但文在同志等不及，错过了我们当